

新民主主義ABC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三

# SHIRAZI

SHIRAZI

CBA底義主主民新  
——三之戰挑的國中色紅——

著 因 坦 史 · 室 根  
譯 薪 荆

新民主主義底CBA  
——紅色中國之三一  
G·史坦因著  
新 荆 譯

出 版 者 晨 社  
經 售 各 大 書 局

·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第一版 ·  
版 權 所 有

## 目 錄

一	延安的政治ABC	一
二	毛澤東的信仰	一一
三	自治政府的實驗室	二八
四	自食其力的公務員	四一
五	中國自己的共產黨	五三

## 一 延安的政治ABC

在一個延安政府的領袖，或是一個農民，或是一個工人提到了許多連我們的國民黨同伴也不知道的，許多新名詞和新口號中底一個時，我們的通譯總是說，延安是有一種特別的政治慣用語的。我費了幾天的功夫把我耳聞目睹的東西爲自己編成了一部共產黨字典。這字典可說對共產黨管轄區的人民底理想和實踐作了一個相當公正和完善的調查。

「活動份子」是在任何村莊里的，工廠里的，或是軍隊里的，學校里的，店鋪里的，合作社里的，驛商隊里的，醫院里的以及任何別的地方的人民，他們對於戰時工作和社會進化有着一種特別的興

趣，並且還顯示了自發的熱忱和進取性。他們看起來是這個新社會中的基本因素，是這個新社會底力量與發育的貯藏所。作了一個活動份子之後，第二步便是常被民衆選舉出來擔任公務，或是擔任一個模範工作者或勞働英雄底職務和責任。他們中間有一小部份最後可能變成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抗日根據地」是在敵後的十八個地區——八個在華北，八個在華中。二個在華南——中；在一九四四年末，人口的總數約有八八、〇〇〇，〇〇〇人。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總數升到了九四、〇〇〇，〇〇〇。那些區域是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取得了當地人民的合作後，從日本人手里解放了出來的；它們而且還被併入了自治的領土單位，來攻守合作地在被佔領的城市和鐵路及公路的兩旁反抗日軍。

「大後方」是國民黨統治的自由中國的名字，是和共產黨在自由中國的小後方根據地——邊區相對照的。

「邊區」是共產黨管轄地區，在延安四周，由西北的陝西，甘肅和甯夏省的某些部份組成，有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口。當地的共產黨黨員早在一九三〇年的內戰中領導過一次土地革命；這地區的大多數地方也就是這些共產黨員所建立的以前的蘇維埃地區。這地區的四周，三面是國民黨的嚴密封鎖，第四面的大部份又被黃河對岸的日本人封鎖着。渡河的服務把鄰近的山西省內的抗日根據地連了起來，通過了橫跨着許多日本防禦線內的河流，把敵後的一切別的共產黨底管轄地區也連了起來。

「幹部」分上中下，是軍隊，黨部，政府，和學校，工廠，合作社以及其他機關中負責的工作人

員。像「官」之類的名詞是要被人哂笑的；所以他們不佩等級的徽章，也沒有官銜。每一個人，包括非共產黨員在內，都以「同志」稱呼，但是祇是用來表示責任的級位，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却是嚴格地遵守的。

「起來」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歌，在延安管轄區的軍隊和人民中間是最普遍的，這支歌還有一張美國保羅羅比遜唱的唱片：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着敵人的炮火。

前進！



冒着敵人的炮火！

前進！前進！前進！進！

『不』在目前是循着這些路線被宣傳着：不要教條化，不要主觀化，不要形式化，不要官僚化，不要宗派化（專對黨員而稱）不要爲自己而寫，要爲羣衆而寫（給作者）；不要脫離羣衆而要信任他們，並且採用一種完全民主的工作方式（給所有的幹部）。

『第八路軍』是國共聯合戰線在抗日戰爭開始時，國民政府稱呼內戰時期的紅軍底名字。這名字變得非常地普遍，甚至使重慶底改變——把八路軍改爲第十八集團軍——也始終沒有在共產黨管轄區內被各階層的人民所採用。兵士和軍官的臂章是『十八集團軍』，但是他們却終被稱爲『The Eighth Routers』，中文的意思就是『八路軍』。在一九四四年春季，第八路軍有三二一、〇〇〇人，但因爲從民軍的後備中它不斷地得到了增加的緣故，到一九四五年的春季，它幾乎已增加到足足有六〇〇、〇〇〇人了。

『抗族』列入了各處都有的榮譽名冊中，他們受到了他們的村和鎮的幫助，方法是不增她們賦稅的負擔，也不建立官僚的組織。特別救助隊在每一個團體里自動地組織了起來幫助他們懇田，紡紗，織布和看護他們的孩子。這些抗族是保證着享有『中農』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

『軍隊中的三大工作』是打擊敵人；幫助人民提高生產；以及爲了戰爭和社會進步而動員組織教育羣衆。

「游擊區」和統一自治的抗日根據地相對照，是共產黨管轄部隊和政治工作人員已經組織了充份而普遍的支持，來阻止日本和他們的傀儡們企圖綏靖和實行軍事行動的區域。在敵人佔有的脆弱陣線那里，都有游擊區的存在。它們把抗日根據地連結了起來。

「內奸」和日本人僱用的賣國賊和傀儡不同，他們是共產黨管轄區內的國民黨特務人員。普遍的「坦白運動」提供了免罪的保證，因此這些特務份子們供認了，普遍的「坦白運動」而且還想法着把這些特務份子，改變成爲新民主主義的忠實支持者。

「精兵簡政」是宣傳得很厲害的澈底實行合理化的一個政策，這個政策是在三年前由一個被人民選舉出來擔任一個高級的政府職位的非共產黨員所提議和介紹的。雖然它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然而現在它仍被應用着。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設在延安和日本佔領區內，而且顯然是和日本本土有着接觸的。這是一個反軍國主義的日本人民的政治組織。這個組織大部份包括着那些已經轉變成爲反法西斯意識的以前的戰俘。它的目的在戰時是消滅日本軍隊和政府，在戰後是創立一個新的日本，所依據的大概是在中國共產黨管轄區內實施的新民主主義底路線。

「國共合作！」是對重慶呼出的民族團結的口號。它是廣大地被共產黨所宣傳着的，而且反復地出現在所有的政治演說中間。

「勞働創造了一切」是一直在牆上見到的警句。爲着共產黨管轄區和外邊世界的隔絕，這是被鄭

重地提出來激起自助的衝動的。

「老百姓」就是「人民」的標準中國話，這恐怕是延安地區內最被應用的字了；因為推進他們的利益和喚醒他們的政治自覺和主動是延安政策在各方面的主要內容。

「向羣衆和羣衆的經驗學習」是毛澤東最喜歡說的話，因為他相信，普通人民在各種事情上的一般常識的判斷和認識以及累積的經驗，是必須由智識份子和專家們去考慮一下的。

「解放中國」是包括着華中華南敵後的共產黨管轄區域的唯一名詞，與延安邊區當地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個別自治與獨立管理的。這些區域雖是各自個別地自治和獨立地管理着，而且不受延安邊區政府的約束，但都是在共產黨的總政策指導之下。

「愛民——擁軍」是最普遍的口號之一。第一半句是向軍隊呼出的，第二半句是向人民呼出的。這二者之間在各項工作方面的切實合作，是延安總政策的基礎。

「寬大政策」已經有了一種新的，普遍的意義，是三年政策的中心思想。「轉變他們和爭取他們」；這個政策是用以改變一切反社會份子的——從無賴，醉漢，和其他倒退份子到日本戰俘，傀儡，賣國賊，內奸和共產黨管轄地區內的反新民主主義者。這新政策替代了內戰日子裏的刑罰的革命方法。

「羣衆運動」，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個特別部門的總的領導之下，是由村，鎮和團體中的活動份子，主要地用討論會，個別的家庭訪問，演戲和讀書團等方法實行出來的。他們的目的

的是在解釋和通俗地來表示政府政策底目的。

「羣衆觀點」在黨，政府，軍隊，和其他團體中是必須加以接受的。找出羣衆的意見和需要，在形成決議和執行決議的過程中來把它們作爲全盤的考慮，這是每個人必須奉行的最高律法。

「民兵」在共產黨管轄區內的數目，在一九四四年年底約計二、二〇〇，〇〇〇人。他們從華中和華北的村、鎮很大的自衛團里選出來的。在他們自己區域里或在附近發生防禦或攻擊行動的情形中，他們被動員了起來，並且他們是少共正規軍的輔助者，也是共產軍的補充後備軍。

「新民主主義」是共產黨在一九四〇年提出的一個永久的政治制度底綱領，並且是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底著作中最受人閱讀的一本書底名字，這本書已經給譯成了英文了。

「新四軍」包括了華中共產黨管轄區內所有的軍隊。它是被重慶的國民政府正式地「解散」了的名稱，也在遭受了政府軍隊對它的總司令部予以意外的襲擊（那時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之後給廢止了。但是自此以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年初，它已從一一〇、〇〇〇人增加到三〇〇、〇〇〇人左右了。

「寡頭政治」——少數人的政府——是批評蔣介石總司令的重慶國民黨一黨政府的標準名詞。

「延安黨校」是一座沒有教師，沒有學程的學校，在它里面，高級和中級幹部，軍隊將領，政府和黨的人員，工廠經理，智識份子，和其他負責的共產黨工作人員們自我學習着，交換着意見，而且

用工作上的自我批判來增進他們的學問。

「人民參議會」是各階層人民民主地選出來的，選舉和監督市邑城鎮，地方和區域的行政機關——它和國民黨地區里的被指定的和祇有諮詢資格的參議會不同。

「走坊郎中」或「巫醫」，是反迷信的羣衆運動的主要目標，也就是普遍實現現代醫藥和衛生底主要目標。

「把一切問題提到理論水準上來」是中國共產黨經常命令一切負責的工作人員時用的馬克斯主義底俚語，那就是，在問題決定之前先將提出了的問題根據一個事實的科學的觀點徹底地研究一下，不要用僥倖的方法，也不要被一向情願的思想所左右。

「減租與減息」——和「保證付租還債」是解決僱農和負有重債者的問題底基本政策。這種新政策的目的是在減少地租至僱農收穫的百份之四十以替代在共產黨內戰時的政策——沒收地主的土地和取消農人的債務。它完成了孫逸仙博士——死去了的國民黨和聯合戰線的領袖——的一個綱領的要求，而且在共產黨管轄區實行了國民政府從未在它治區內實行過的一個十年議定。

「口號」在共產黨的中國甚至比在共產黨的俄國起了更大的作用，這是動員和教育文化和政治的瞭解水準低而幼稚的社會的一個現實方法。

「鬥爭會議」是各種黨派和政府機關，陸軍部隊，學校，工廠等所偶然召集的，它的目的是在完改良，調解紛爭，和解決個人的犯罪，不論他們的地位如何，他們在各階級中都是用自由，公開的

方法來討論的。相互批判，和自我批評是這些會議的特點。

「日本人的三光政策」是殺光，燒光，搶光；在華北華中各戰區，這是人民在積極參加繼續爭取食物，給養和據點中每天碰到的鬭爭。

「三三制」是新民主主義的重要基礎，在它下面，中國共產黨自動地限制了它自己的權力而且鼓勵了別的政治份子的合作。選舉人祇能在任何人民參議會里選舉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其他黨的代表能夠選出有其他三分之一的議員來，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票是屬於無黨派的候選人的。

「耕二餘一」是爲着準備存糧以防可能的歉收以及進行反攻而提出來的口號，在這口號之下，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實行了更進一步的農業增產。

「自己動手自己生產養自己」本來是毛澤東在一九四〇年的一個危急的經濟情形中發給所有共產黨員的訓令，但現在，這已經變成了所有軍隊，行政機關，和教育機關對於他們黨員的經常命令了。每一個人，自最高至最低的級位，必須在工作時間之外做農業的或者其他生產的工作，目的爲着要增加生產，而且使人民的賦稅負擔儘可能地減低。

「鄉村會議」選舉了村長和控制了村長的活動，並且討論了增加生產和其他改良的方法。在這種鄉村會議里，每個成年人都有平等的選舉權。它們是中國第一次要想努力於自治政體的基礎。

「豐衣足食」是新民主主義的第一個口號，是在一九四〇年的普遍的貧窮中想出來作爲生產運動底目的和希望的。它在邊區和一部份的戰區里已經變成了一種事實；然而在敵後的幾個受苦最深的抗

日根據地里，這依然是一種重要的宣傳要素。

「工作不忘學習，學習不忘工作」這一口號是爲着要使學校和學院的教育政策更加實際和更直接地有利於人民，這也爲着要提高農工的教育標準。

「秧歌」，是西北中國的一種古代的民間舞蹈，經過了共產黨的復興和政治化之後已經像野火一般地傳播到他們所有的地區里去了。這是一種舞蹈和戲劇的聯合，用一種藝術的逗人的方法以使各種不同的羣衆運動的口號通俗化起來。

「咱們邊區」是在人民的談話中和他們的歌唱中親切地被應用着。這些話總括了中國最落後的地區之一在和日本的戰爭以及重慶政府對邊區的封鎖中所贏得的進步和驕傲。

## 二 毛澤東的信仰

「你們不能夠沒有共產黨那個難聽的名字嗎？」有一些看重延安的作戰力和延安對民主和團結所懷的願望底聯合國外交家和軍事長官，最近一直這樣地問着中國共產黨。

「從一般人對共產黨這名字所懷的意義來看，你們不像共產黨」，他們的辯論常常是這樣開始的，「你們祇是社會改革家而已；而且你們甚至還說你們的政治制度是新民主主義呢。把中國共產黨這名字加以一個適當的改變會使我們國內的人民更容易明白你們對將來的真正目的和希望，因為在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懷疑「共產黨」這一個字的。這可以使協約國和你們的軍隊容易在抗日戰爭中合作起來」。



延安的領袖們和駐在重慶的延安的代表們會在他們的回答中指出，他們不能改變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不但現在是並且還想繼續是共產黨員。他們會解釋，作爲共產黨員的意思祇不過是接受馬克斯的思想方法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已；但是中國必須尋求什麼方法，以及在什麼時候介紹共產制度的社會生活是完全須視每一個各別的共產黨所屬的國家中的基本情形而定的。因爲馬克斯底共產主義的學說，明白地要求它的黨員們必須以一種正確的政治方式來接近一個特定的社會里所通行的特殊情形。它詛咒在社會構成不同的國家里採用同樣的革命政策。

他們會繼續下去說，中國因爲在經濟方面主要的是農業的，在政治上大部份是半封建的，所以在實行共產主義或甚至是實行現在蘇聯發展了的預備的社會主義，那末離開成熟的時期也還是很遠。

中國先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演變；在這個時期中間，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同等需要的，因爲那樣才能替日後走向下一個社會主義階段底進步奠下一個基礎。

中國共產黨相信，從現在那種半封建的國民黨的獨裁制度到民主主義，再從民主政治到社會主義，最後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底轉變是能夠成爲一種和平和無痛苦的進步的。唯一的條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須毫不遲延地實現；同時，中國的社會制度依然是非常適合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的，祇要這個發展不染有在別的國家里有的那些有害的社會副產品。

假使共產黨在全國的其他政治團體分享了權力，正如它在擁有九千萬人民的延安的解放中國里已經做到了的那樣；那末階級鬭爭就毋須像在別的國家內一樣地表現出來了，它將循着進化的道路繼續